



探寻吴文藻的学者本色



摘自《吴文藻传——从社会学中国化到重建中国社会学》，孙飞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

1982年底,时年81岁的吴文藻,在《晋阳学刊》当年第6期上发表了《吴文藻自传》一文。大约三年后,1985年9月24日,吴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4岁。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可以说是吴先生对自己生平最系统、最慎重的总结。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仍然雄心勃勃地说:

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现在重建和创新工作还有许多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出贡献。

在吴先生去世一年之后,冰心先生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文中多少带点“嗔怪”地写到了吴先生的这篇自传。她说,这篇自传里讲的是:

他自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课,从哪位老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

冰心先生在许多其他文章里讲述吴先生时,常用“书呆子”这个词。她在此处的这番强调也是这个意思。这与吴先生在自

传最后的自陈心迹一起,极为传神地表达出他的人格气质。

从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跌宕起伏的百年历史来看,吴先生更为人知的贡献在于他对这门学问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建设,以及用心良苦的布局和指导。他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并对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精心设计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道路,苦心孤诣地培养了诸多社会学人才;他积极奔走于世界各国学术界,既宣传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也为中国学界引入新知识。他阐幽抉微,精研世界各国社会学流派,取长补短,开创了社会学社区研究的先河。在生命的后半期,他又和费孝通等人开展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民族研究,“在整个民族学的发展和培养人才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还与冰心先生等人共同做了大量翻译工作。如此种种,都使他不仅成为中国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而且在更为广泛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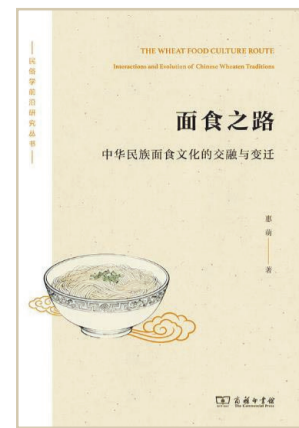
吴先生在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遭遇了日军侵华。在南下任教于云南大学后不久,他又出于各种原因离开学界,前往重庆,进入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主要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

教育问题。此后,虽然他依然关心和支持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发展,但是研究方面的许多设想和计划更多是由他的学生完成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先生作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第二组的组长,前往日本处理日本战后投降事宜,而他真正的心愿则是将战后日本作为一个大型社会调研场地,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在日本,他依然不失学者本色,在工作之余,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了当时日本的社会与文化状况。

在日期间,吴先生逐渐下定了回国的决心、做好了回国的计划,最终在1951年携全家回到了祖国。在回国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他遭受了不公待遇,历经诸多磨难,但是在艰苦的岁月中,他以认真的态度面对一切,保持真诚的思考,坚持从事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积极投身社会学的重建工作,真正展现了一位学者的本色。虽然吴先生留下的著述不多,但他极具代表性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早已超越学术研究的范畴。他的生命成为比他的著作更好的关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学文本。

在这部传记中,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他前半生的著述和后半生的生命历程,去探寻一位学者的本色故事。



《面食之路:中华民族面食的交融与变迁》,惠萌著,商务印书馆2025年12月出版。

“面食之路”也是“筷子之路”

禾刀

饮食的历史向来很迷人,因为很容易激起读者舌尖上的味蕾。世界上,没有哪种食物像面食这样奇妙,面食就像一张无所不能的食物门票,几乎各种民族或多或少均有所食用,且做法形式多样各异。仅在面条大省山西,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口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亚洲人绝对主食的大米,其做法则大同小异。

本书作者惠萌是民族学博士,长期致力于民族交流、民俗文化与秦汉历史研究,尤其关注饮食文化的演变与传播。本书中,惠萌以田野观察方式,聚焦面食在中原、西域(本书特指河西走廊以西)乃至更广阔的欧亚大陆的传播脉络。在这条面食占据人们食物极大权重的路线上,饼、馒头、面条等特色面食以各种不同形态镶嵌在这条漫长的欧亚路线图上,惠萌形象地称之为“面食之路”。

提到“面食之路”,很容易让人想起与这条路线高度重合的另一条路线,即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而在惠萌看来,“农作物和饮食方式的流动时间是要早于手工业制品的。或许也可以说食物和饮食方式是人类文明间最初的交流。而且,饮食文化是在各个文明间不断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发展的”。换句话说,充足的食物保障,是人类从事其他文明交流的重要基础。

大约一万年,小麦在西亚新月沃地被人驯化。大约4500年前,小麦等作物传播到中国东部地区。不过,传播也仅仅是抵达,并不意味着大面积种植,因为旋转石磨和发酵技术还未发明。当时,人类“食用粉食食物只能依靠‘春粉技术’”,而小麦“表皮纤维较硬,粒食食用后难以被消化”。虽然青海喇嘛遗址出土的面条被誉为“中华第一面”,但其成分实际是粟和黍。另一个制约小麦大面积种植的则是水源,粟和黍的最大种植特点是耐旱。

研究发现,“秦汉时期,小麦在中国黄河流域地区的种植面积有一个大的爆发”。惠萌认为,这与秦汉时期对水利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种植条件虽然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小麦进入人类主要食谱还必须解决磨粉去皮问题,才有可能真正从传统的粒食过渡到如今的粉食。有学者指出,“我国古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是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的”。旋转石磨的出现,大大改善了小麦从粒食到粉食的加工技术,但从面粉到五花八门的面食,则又经历了一个漫长且相互交融影响的过程。我们无法想象,在旋转石磨发明前,面食最初出现在餐桌上时,会是怎样的一种形态。

惠萌指出,至少唐代以前,面食种类相对较少,面食依旧只能扮演果腹的单调食物角色。面食在黄河流域的大爆发,除了水利设施建设和旋转石磨的发明之外,发酵技术的出现,则是打开面食的最后一道普及大门。“运用发酵法对面团进行加工,可以使‘死面’变为‘发面’。利用发面做出的面食食物更便于烹饪、食用和消化”。今天许多人对发酵技术并不陌生,没有发酵或发酵不足的面食,蒸熟后常被人们戏称为石头,坚硬难以下咽。

至此我们或可梳理出这样一条路线图,即大小麦从西亚进入西域,再沿河西走廊传播至黄河流域。不过,文明的传播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无数人日积月累反复往返的结果。随着黄河流域人们对面粉加工技术的改进,特别是筛罗的出现,进一步提升了面粉的品质,饺子、馄饨等面食开始出现,终被“来自中原的人因戍边或迁徙带到西域地区”。

相较于黄河流域人们对蒸煮面食的情有独钟,西域地区的人们则以烘烤面食为主,像西亚传来的馕,如今成为新疆人的食物基因。烘烤面食与粟、黍,以及煮煮面食的最大不同在于,可以长时间存放和携带。这也印证了像馕、饼等烘烤类食物为什会在干旱、半干旱区域的传播更为广泛。

河西走廊和西域是中国与西亚文化的一大交汇地,长期扮演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角色。西亚传来的馕和饼在新疆扎下了根,而黄河流域喜闻乐见的蒸制面食传到了河西走廊,并最终在西域新疆扎根。有趣的是,馕并没有再向东延伸,而蒸制面食也停止了脚步。两种不同面食在西域的同台共舞,形成了舌尖上的包容特色。

就面食的传播交融,惠萌特别从传播学角度加以解析。同许多文明的传播特点一样,面食的传播同样来自民间的巨大内生动力。“地域的毗连让人的流动以及文化的交往成为可能”,行政区划不可能成为交流的真正阻隔。惠萌同时指出,“那种把‘面食之路’想象成是由某人,例如由伟大的马可·波罗到中国学会了面食技术,再把它带回意大利老家之类肤浅的风评,犹如把‘丝绸之路’想象成某商队从罗马或波斯出发带着某些货物到中国,再从长安或洛阳购买丝绸,把它一直运到欧洲,卖给那些贵妇人的浪漫想象一样,完全是靠不住的”。

不过,总有一些民间传说,习惯将这些传播与某些名人挂起钩来。如麻食的起源,民间传说中的主角有忽必烈、乾隆等。将传说与地方名人予以适配,这在世界各地并不鲜见,其优点不外乎其二:既为传播提高名声和地位,也为突出名人的超凡见识,烘托其过人智识。事实上,许多饮食包括面食花样种类的发明并非来自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更大可能是底层民众出于各种环境而作出的渐次改进。

惠萌通过分析对比发现,面食的传播契合了筷子覆盖范围。众所周知,除了中国,使用筷子的国家还有东亚的朝鲜和日本,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由于面条传统的分布地区,基本上也就是筷子的分布地区。所以,所谓‘丝绸之路’的前身,应该首先是‘小麦之路’,但同时它还是‘面食之路’和‘筷子之路’”。

在历史的长河中,面食文化的传播跨越了多个地域,各地之间的饮食方式也在相互影响不断渗透,但我们也应看到,在这个“全球变平”相互渗透的时代,面食的地域性特色反倒稳如泰山:被新疆人奉为至爱的馕,在新疆以东的地区依旧不多见。被北方人钟爱的饺子,在南方的普及度仍旧相差甚远。我们有理由相信,饮食文明的传播虽然与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密切的关联,但同时也会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坚守自己的地域特色。一言以蔽之,面食文明的交融与变迁,折射出人类文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同时又与其他文化交融沉淀,自成特色,这或是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成因。

2026世界杯的全新注解

刘金祥



《你好,世界杯2026》,刘金祥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6年4月出版。

者,而是经年置身欧洲各大联赛球场的解说者,那种亲历的在场感,那种对赛场瞬息万变的敏锐与直觉,是坐在电视机前的普通观众难以替代的。王正坤为这本书倾注了宝贵时光和大量心血,他追踪各大洲的每一场预选赛,记录每场比赛球员的伤病讯息,解析每支球队的初选名单。这对于一个足球解说员来说,意味着无数个白日与夜晚的坚持与守候,意味着对大量比赛数据的梳理与修订,这是一项艰苦工作,绝非可以交由AI代劳。这是一场用激情和热情浇灌的足球朝圣。

足球比赛从来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它植根于现实土壤,折射着时代风云、地域文化与社会结构。翻阅《你好,世界杯2026》,读者也许会发现它不仅仅是数据的统计与罗列,更是对参赛队伍的洞察与预判。例如书中叙及法国队,作者不是只分析“姆巴佩很强”这一单项,而是借此深入阐述第三替补的战术定位,运用表格和站位图回应球迷的关注和疑虑。再如书中讲述阿根廷队时,作者将其高居南美预选赛榜首的背后逻辑详尽说出,使读者对“潘帕斯雄鹰”再次充满期待。该书如同一位耐心细致的旅游向导,把首次入选球队的出线秘笈娓娓道来,比如佛得角队究竟靠什么秘诀力压非洲雄狮喀麦隆?再比如乌兹别克斯坦队养精蓄锐二十四年后踏上世界杯征程的底气何在?再比如挪威拥有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实力球员,却总被媒体低

估,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解答,如果仅靠网上碎片化的信息,无疑是盲人摸象,而借助这本书,你也许就会对各支球队的前景有个理性预测。这让我想起美国电影《死亡诗社》里的那句经典台词:“诗歌、美、浪漫、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这句经典台词也可以诠释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内在法度与深层逻辑。足球比赛绝不仅仅是二十个人追逐一只皮球的简单娱乐活动,它关乎一支球队的胜利与失败,更关乎一个国家的尊严与梦想;它摒弃数据的冰冷与枯燥,却关注人性的多面与复杂,作者王正坤深谙此理。他在书中,不仅拆解比赛战术和排兵布阵,还为每支球队留下了一个“读完就想发朋友圈的故事”。那些或暖心或悲壮的故事,或许与一名球员的成功逆袭有关,或许与一个国家的殷殷期盼有关,或许与足球背后被时代遮蔽的喜悦哀乐有关。正是这些鲜活生动的故事,让一本观赛指南有了温情和心跳。2026年世界杯还有一个难以规避的悲怆主题:诸神离去,巨星告别。无论是梅西,抑或C罗,还是莫德里奇,这些跨时代的足球巨星,极有可能在这个夏天上演谢幕大戏。诸神的告别演出,往往最令球迷动容,也最让球迷珍惜。《你好,世界杯2026》在工具书的表面之下,氤氲着对球星告别的深沉敬意。该书记录下那些在世界杯赛场上驰骋纵横、独步天下的伟大名字,为他们也为追随他们走过整个青春季的球迷们,留存了一份历史档案。

此刻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你好,世界杯2026》一书的意义,也许会比其他时段更为清晰。当球迷们守在凌晨的电视机前,为每一个进球欢呼雀跃或扼腕惋惜,当球迷们在网络平台上,与五湖四海的球迷讨论哪支球队风头正健,哪支球队疲态已显,这本书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你的身边,它既是一份可供随时查阅的观赛攻略,也是一份不会被岁月稀释的美好记忆。多年以后,当人们回想起2026年夏天的世界杯,回想起球星们的最后表演,打开泛黄的书页,一切都仿佛发生在昨日。从更久远角度来看,《你好,世界杯2026》一书,事实上也是在向传统足球信息传播方式致敬。在抖音、短视频与微信平台异常发达的今天,王正坤专心写作此书并以其与球迷对话,这本身就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他提醒人们有些理解需要慢下来,有些热爱值得沉下去,本书所做的,正是让这种理解和热爱成为可能。绿茵场的喧嚣终究会沉寂,美加墨世界杯终会落幕,但翻阅书页的声音,也许将陪伴人们走过下一个四年。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读懂不一样的苏东坡

胡忠伟

苏轼,这个艺术世界的天才,一开场,就是巅峰。开科考试,他一举成名,成了北宋开国百年第一,深得欧阳修等文坛大佬赞叹和厚爱,也赢得了皇家的喜欢。然而,职场不是爽文,再牛的心气也要被调教,一场“乌台诗案”就是命运对他的考验。此后的人生走向,就是在被贬和召回的起起伏伏中轮换,而他也由此回归最日常的生活,回到生活的每一件小事中,默坐省察,将过往一一复盘、清零,修炼人生,静养身心,为走出人生的低谷做着全面的准备。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惠州、在儋州,他煮东坡肉、剔羊肋骨……美食治愈了他;他结交好友,无论贩夫走卒、官场中人、寺院僧众,还是他的学生、师长、兄弟、侍妾,聊人生,话桑麻,志趣相投,休戚与共,在人生的关键处这些人都会拉他一把;刻骨铭心的爱情,知己红颜的陪伴,平常生活的扶持相依,这些亲密的关系

给了苏东坡最真实最丰厚的抚慰;加上良好的家风和来自故乡的力量,诸多因素,使这位文坛得意、政坛失意的男人,认清了现实,认识了自己,学会了“放下”,“活”了出来,活出了境界,活出了自我。“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诗酒趁年华”“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暮年回首,他明白了:“问汝平生功业,惠州惠州惠州”。在政治风雨的洗礼中,苏轼和自己达成了和解,也和命运达成了和解,活成了一个自在人,一个快乐的闲人,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超脱之人。

尽管本书部分史实仍有可商榷之处,但随着阅读,一路追随苏轼,反观自己的人生,那些曾经的伤害、失意、彷徨、忧伤、抑郁,等等,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人生缘何不快乐,只是没遇苏东坡”,人生本就没有答案,有的只是选择,有的只是忠于内心的选择。这或许就是苏东坡给予我们的人生启示。



《人生得遇苏东坡》,意公子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体现出他儒、道、释三家兼收并蓄的独特思想;创作于黄州时的书法作品《寒食帖》,成为后世“天下第三行书”;他的书画艺术价值极高,他的《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作品,开创了“文人画”的先河,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这举世无双的才情和创作实绩,与他的仕途起伏和人生跌宕不无关系。

时令进入2026年夏天,足球正在北美大陆上演旷世盛典。当美加墨三国版图徐徐展开,当四十八支球队在十六座城市的绿茵场次第亮相,足球解说员王正坤撰写的《你好,世界杯2026》一书,正缓缓落在球迷案头。这本书绝非普通观赛指南,在它简洁素朴的封面之下,蕴含着一个个时代的足球密码——该书以客观翔实的史料、细腻流畅的笔触,试图为一个参赛成员众多、比赛场次密集、观众海量的大型赛事,中国本土观众需要的,是一双能看清整个比赛状态的“全息”眼睛,是一册可以随时查询赛事信息的“足球地图”,这也正是《你好,世界杯2026》一书的使用价值和现实意义。换言之,这本书既不是一本对足球抒发情感的散文集,也不是一册记述美加墨三国十六城风土人情的地理游记,而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全景观赛导引。该书将四十八支球队单独成篇,从对各支队伍的架构解析到排兵布阵的前瞻预测,从阐述各支队伍的独门绝技与核心战术,到陈述各支队伍的鲜为人知的备战故事,引领读者跳出赛场画面,从另一个角度读懂本届世界杯。这幅“世界杯地图”的设计者和绘制者,就是我国新生代足球解说员王正坤,他的职业身份赋予了这本书独特的功能。王正坤曾多次解说英超、西甲、德甲、意甲等欧洲顶级足球联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他作为我国最年轻的持证记者亲赴赛场实地进行报道。王正坤不是坐在书房里的足球理论研

究。王正坤不是坐在书房里的足球理论研究者,而是经年置身欧洲各大联赛球场的解说者,那种亲历的在场感,那种对赛场瞬息万变的敏锐与直觉,是坐在电视机前的普通观众难以替代的。王正坤为这本书倾注了宝贵时光和大量心血,他追踪各大洲的每一场预选赛,记录每场比赛球员的伤病讯息,解析每支球队的初选名单。这对于一个足球解说员来说,意味着无数个白日与夜晚的坚持与守候,意味着对大量比赛数据的梳理与修订,这是一项艰苦工作,绝非可以交由AI代劳。这是一场用激情和热情浇灌的足球朝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意公子《人生得遇苏东坡》,用九个章节,从惊讶、敬佩、深识、感慨、羡慕、赞叹、了悟、内观、活法等角度出发,结合现代人所面临的心理问题和情绪困境,立体而详细地解读了苏东坡的人生细节:高峰与低谷、家庭与情感、仕途与交友、作品与人生等,在深度的情感共鸣中,让读者体悟到苏东坡与命运和解的方法,也通过还原个体认识苏东坡的全过程,使我们每个人都读懂了不一样的苏东坡,同时,也从他身上照见了自己的人生。

这本书的写法新颖,视角独特,与一般的传记不同,摒弃了以传主一生大事为线索写传主的传统写法,而是精心剪辑苏轼一生最紧要的几个关节点,横截面,传评结合,以评为主,既尊重历史和文化传统,又融入了个体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共鸣,为我们呈现了人人心中不同的东坡形象,诗人一生的起伏和光辉亮点,给读者留下了极其鲜明的个性感受。

从才情上讲,苏轼达到了北宋文人的高峰。千百年来,他的诗词书画,无人能出其右。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的诗词,既有豪放粗犷的一面,也有婉约柔润的一面。他的